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

——基于企业冗员的证据

楚有为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我国企业普遍背负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利用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从审计费用视角,以企业冗员为例,检验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操纵是导致上述效应的三个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受到劳动保护程度的影响,劳动保护程度越高,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越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另外,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增加既有审计师增加了审计投入的原因,也有风险溢价的原因。研究表明,政策性负担对企业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审计师在做出审计收费决策时考虑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政策性负担;企业冗员;审计费用;经营风险;代理成本;盈余管理;审计意见;审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0)05-0010-08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维持地方稳定和提高政绩的目的,往往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使我国企业普遍背负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是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直接手段之一。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就业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与地方官员的重点关注内容,也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1],地方政府要求企业雇佣更多员工是一种常见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存在负面影响,以冗员负担为例,有研究发现冗员负担不仅使得企业员工配置偏离最优水平,直接增加了劳动力成本^[2],而且会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的降低^[3-5],弱化薪酬激励,增加代理成本等经济后果^[1]。

政策性负担能够影响审计师执业风险,进而改变审计师的风险应对决策。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审计师需根据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将审计风险控制到可接受水平。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政策性负担会导致较高的经营风险与管理层代理问题,为了应对审计风险,审计师需要将检查风险控制到较低水平,审计师会给予上市公司更多的职业关注,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增加审计成本,进而增加作为成本补偿的审计费用;同时审计师还会为了补偿职业责任风险而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作为风险溢价。政策性负担对审计师收费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足。本文以2007—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冗余雇员这种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从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视角检验了政策性负担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此外,由于劳动保护程度直接影响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附加成本,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策干预,故本文还检验了劳动保护和产权性质对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本文从审计视角,考察政策性负担对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拓展了政策性负担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现有关于政策性负担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着眼于政策性负担对公司业绩、公司价值和代理问题的影响,本文将这一思路延伸到审计领域,考察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会否提高审计风险并影响审计师决策,从审计角度考察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的影响。第二,本文从员工配置和劳动力成本角度,深入探讨了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审计师决策是否关注了客户政策性负担所伴随的风险,考察政策性负

[收稿日期]2020-05-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630223)

[作者简介]楚有为(198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研究,E-mail:chuyw2015@126.com。

担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从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质量角度分析了政策性负担影响审计费用的潜在渠道,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回顾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出于维持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福利和完成政治晋升目标的动机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向企业施加政策性负担。解决就业问题、控制地区失业率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要求企业雇佣更多员工是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最常见手段之一^[2]。政府可通过直接控制公司管理层的任命或利用高管行政级别晋升,干预国有上市公司员工配置^[3,6]。当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时,非国有上市公司同样会因受到政府干预而被要求承担扩大就业的社会功能^[7]。上市公司作为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会因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而超额雇佣员工,造成冗员负担。企业上市过程中需要接受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和帮助,上市公司会获得地方政府的扶持^[8],并通过政策性负担回馈政府扶持,地方政府还会通过政治关联和税收征管等方式影响上市公司人员配置,造成冗员问题^[5]。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具有负面影响,以企业冗员为例,现有研究发现冗员负担直接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2],加剧了代理问题^[1],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1]和公司价值降低^[5]。

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9]。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10],而经营风险是重大错报风险的重要来源^[11],多数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产生财务后果,从而影响财务报表。因此,当客户经营风险较高时,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将检查风险控制较低水平,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费用。例如,有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了审计费用^[12];由于经营风险效应,企业面临的进口竞争对审计费用有正向影响^[13]。外部审计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缓解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越大、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也越高。因此,代理问题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持有较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往往代理问题较严重,导致审计师投入和审计收费的增加^[14-15]。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现有关于政策性负担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着眼于政策性负担对公司业绩、公司价值和代理问题的影响,但鲜有文献考察其对企业经营的负面效应是否会导致较高的审计风险,并影响审计师决策。从另一个角度看,政策性负担会加剧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理应是影响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审计收费决策是审计师执业过程中重要的风险应对决策之一,但目前尚无文献关注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政策性负担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会反映在包括审计收费在内的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上。Simunic 率先考察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16],随后大量研究表明客户风险和代理问题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两者对审计收费决策具有显著影响^[9,12]。政策性负担会引起较高的经营风险和严重的代理问题,从而引起较高的审计风险并增加审计收费。政策性负担可以通过提高经营风险水平进而影响重大错报风险。以冗员负担为例,冗员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冗员负担直接增加了上市公司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耗费^[2],从而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企业在承担政策性负担后,为了维持其持续经营,政府会通过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等方式对该政策性负担进行补偿^[4],企业经营业绩有政府补贴兜底,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目标异化,降低薪酬激励^[1],管理层激励不足会负向影响企业长期业绩。另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可能会挤出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竞争能力,加速业绩下滑风险。业绩下行会增加财务风险,引发持续经营和退市风险。经营风险的提高意味着公司经营情况复杂化,导致记录企业经济活动的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加,为了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审计师需要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审计程序的范围,以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造成审计费用的增加。

政策性负担还可以通过影响代理成本增加重大错报风险。政策性负担会导致经营目标异化^[17],进而造成公司治理机制的异化。政策性负担会降低公司业绩,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管理层可将经营不善归咎于政策性负担,从而增加了管理层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1]。较高的代理成本意味着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较高,审计师所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上升。代理问题还会导致管理层业绩操纵:一方面,政策性负担降低了上市公司业绩,作为补偿,政府会对这些企业给予一定补贴,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往往会利用盈余操纵压缩账面利润或夸大亏损程度^[18];另一方面,政府补贴属于非经常性项目,管理层利用这类项目调节利润比较便利。政策性负担提高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可能性,增加了舞弊风险,审计师需要增加必要的审计程序,导致审计费用增加。

由上述分析可见,政策性负担增加了重大错报风险:一方面,审计师需要通过降低自身的检查风险来控制整体的审计风险,为此需要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实质性测试范围,延长审计时间,审计师会向被审计单位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额外的审计投入;另一方面,当审计风险较高,审计失败面临的处罚和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索取风险溢价来弥补审计失败时造成的损失。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费用越高。

本文还关注了政策性负担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首先,政策性负担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影响审计收费。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经营风险比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范围更广,并且包括重大错报风险。政策性负担提高了企业劳动力成本,异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降低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损害企业长期业绩表现,增加业绩下行风险,经营风险主要是由下行因素所致^[19],政策性负担导致企业业绩下滑,增加了经营风险,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审计风险,审计师会提高审计收费。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2.1。

假设2.1: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经营风险越大,进而导致审计费用越高。

其次,政策性负担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影响审计收费。政策性负担降低了企业经营业绩,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业绩下滑的原因,增加了监督和激励高管的难度以及管理层道德风险,提高了代理成本,较高的代理成本意味着上市公司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较高,内部控制无法发现和防范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加。为了应对较高的审计风险,审计师会提高收费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2。

假设2.2: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代理成本越高,进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

最后,政策性负担可以通过增加盈余管理影响审计收费。冗员问题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政府通常会利用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手段补偿企业增加的用工成本,企业为了获取更多政府补偿,往往会压缩账面利润或夸大亏损程度^[18],显著增加了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程度^[20]。虽然企业冗员会降低经营业绩,但由于冗员负担降低了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1],管理层通过正向操纵业绩实现利润目标的动机大为降低。盈余管理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21],严重的盈余管理可能表明企业存在由于舞弊而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为了应对舞弊风险,注册会计师会提高审计收费。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3。

假设2.3: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盈余管理越严重,进而导致审计费用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7年我国颁布并实施了新的会计准则,为了防止会计准则变化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样本从2007年开始,选取2007—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计算企业冗员程度和盈余管理水平,剔除数据缺失和年度行业样本量小于8个的公司样本。本文所使用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行业分类除制造业采取两位代码外,其他行业采用一位代码。为了消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1)验证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ln FEE$ 为当年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为政策性负担,本文利用企业冗员程度($EXEMP$)衡量政策性负担。

$$\ln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EXEMP_{i,t} + \alpha_2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参考曾庆生和陈信元^[2]以及杨德明和赵璨^[5]的研究,本文建立如下模型(2)计算企业冗员程度($EXEMP$)。其中 Emp 为每百万资产员工人数,模型中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Roa)和资产结构(Ppe),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分行业不分年度(控制年度效应)、不分行业和年度(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分别估算上市公司冗员程度,并获得三个变量 $EXEMP1$ 、 $EXEMP2$ 和 $EXEMP3$;本文还构建企业冗员虚拟变量 $EXEMP4$,当 $EXEMP1$ 、 $EXEMP2$ 和 $EXEMP3$ 同时大于0时取1,否则为0。

$$Emp_{i,t} = \beta_0 + \beta_1 Size_{i,t} + \beta_2 Lev_{i,t} + \beta_3 Growth_{i,t} + \beta_4 Roa_{i,t} + \beta_5 Ppe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另外,参考方红星和张勇^[11]以及褚剑等^[12]的研究,本文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如下变量: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

的对数;财务杠杆(*LEV*),总负债比总资产;应收账款比例(*REC*),应收账款比总资产;存货比例(*INVR*),存货净值比总资产;经营性现金流(*OCF*),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比营业收入;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比总资产均值;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百分比;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人数;产权性质(*SOE*),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或国有企业取1,否则为0;事务所规模(*BIG4*),当审计师为“国际四大”时取1,否则为0;审计意见(*MAO*),当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0,否则为1。另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企业政策性负担增加审计费用,可能是通过增加经营风险、增加代理成本和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三个途径。为了检验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理,参考温忠麟等^[22]的方法,本文设计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3),并利用Sobel检验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成立。其中*X*表示中介变量,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分别用下行风险(*EDR*)、代理成本(*AGCOST*)和操控性应计(*DA⁻*)表示。

$$\ln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EXEMP_{i,t} + \alpha_2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A)$$

$$X_{i,t} = \beta_0 + \beta_1 EXEMP_{i,t} + \beta_2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B)$$

$$\ln FEE_{i,t} = \gamma_0 + \gamma_1 EXEMP_{i,t} + \gamma_2 X_{i,t} + \gamma_3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C)$$

企业经营风险主要是由下行因素导致的^[19],但现有文献利用业绩波动等财务指标衡量的经营风险一般同等地对待业绩的上行和下行变化,这种衡量方式无法充分反映负面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23]。政策性负担造成企业业绩下滑,本文选择下行风险(*EDR*)衡量经营风险。参考Konchitchki等的方法^[23],本文利用如下模型(4)计算上市公司下行风险, γ_{it} 表示*t*年度上市公司实际业绩, τ_{it} 表示*t*年度上市公司预期业绩。预期业绩利用模型(5)估计,为了尽可能地排除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因素对业绩的影响,业绩指标(*ROA_p*)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总资产表示,*SALE*表示营业收入比总资产,*STD_{ROA_p}*为*ROA_p*五年标准差,*OC*为营业周期。本文利用该模型分行业进行五年滚动回归(即*t*-4年到*t*年)计算企业预期业绩。

$$EDR_{it} = \log \left\{ \frac{1 + \sqrt{\left[\frac{1}{N} \sum_{\gamma_{it} < \tau_{it}} (\tau_{it} - \gamma_{it})^2 \right]}}{1 + \sqrt{\left[\frac{1}{N} \sum_{\gamma_{it} \geq \tau_{it}} (\tau_{it} - \gamma_{it})^2 \right]}} \right\} \quad (4)$$

$$ROA_{p_{it}} = \alpha_0 + \alpha_1 ROA_{p_{i,t-1}} + \alpha_2 SALE_{i,t-1} + \alpha_3 SIZE_{i,t-1} + \alpha_4 LEV_{i,t-1} + \alpha_5 STD_{ROA_{p_{i,t-1}}} + \alpha_6 OC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5)$$

参考现有文献^[12,24],本文利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比营业收入衡量代理成本(*AGCOST*)。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操控性应计(*DA*)^[25],模型中*TA*为应计利润,*A*为总资产,*REV*为主营业务收入,*REC*为应收账款,*PPE*为固定资产。根据上文分析,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后,为获取政府补偿,往往会压缩账面利润或夸大亏损程度^[18],增加了企业负向盈余管理^[20]。因此,本文仅考虑负向盈余管理,剔除*DA*大于0的数据,当*DA*小于0时,将*DA*取绝对值计为负向盈余管理水平(*DA⁻*)。

$$\frac{TA_{i,t}}{A_{i,t-1}} = \frac{\beta_1}{A_{i,t-1}} + \gamma_1 \frac{\Delta REV_{i,t} - \Delta REC_{i,t}}{A_{i,t-1}} + \gamma_2 \frac{PPE_{i,t}}{A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6)$$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ln*FEE*的最大值为15.624,最小值为12.301;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用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n <i>FEE</i>	23122	13.497	0.629	12.301	13.400	15.624
<i>EXEMP1</i>	23122	0.004	0.622	-2.253	-0.093	3.593
<i>EXEMP2</i>	23122	0.005	0.672	-2.392	-0.124	3.676
<i>EXEMP3</i>	23122	0.005	0.662	-1.903	-0.121	3.914
<i>EXEMP4</i>	23122	0.302	0.459	0.000	0.000	1.000
<i>EDR</i>	11674	-0.000	0.034	-0.134	-0.001	0.188
<i>AGCOST</i>	23122	0.174	0.143	0.016	0.135	0.841
<i>DA⁻</i>	11857	0.059	0.059	0.001	0.042	0.326
<i>SIZE</i>	23122	21.978	1.265	19.244	21.833	25.668
<i>LEV</i>	23122	0.450	0.218	0.053	0.444	1.035
<i>REC</i>	23122	0.109	0.100	0.000	0.084	0.453
<i>INR</i>	23122	0.157	0.147	0.000	0.119	0.745
<i>OCF</i>	23122	0.074	0.224	-1.084	0.072	0.743
<i>ROA</i>	23122	0.041	0.061	-0.199	0.038	0.229
<i>GROWTH</i>	23122	0.215	0.558	-0.613	0.118	3.948
<i>TOP1</i>	23122	35.289	14.925	9.230	33.260	74.870
<i>BOARD</i>	23122	8.736	1.721	5.000	9.000	15.000
<i>SOE</i>	23122	0.436	0.496	0.000	0.000	1.000
<i>BIG4</i>	23122	0.049	0.216	0.000	0.000	1.000
<i>MAO</i>	23122	0.041	0.198	0.000	0.000	1.000

三种方式衡量的冗员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但冗员负担的三个变量(*EXEMP1/EXEMP2/EXEMP3*)与审计费用(*lnFEE*)的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关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支持了假设 1^①。

(二) 回归分析

表 2 为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控制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表中的列(1)至列(4)分别用上文所述的四种方式度量企业冗员程度,冗员负担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政策性负担越严重,审计费用越高,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表 3 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作用机理的中介效应检验,本部分检验中解释变量为 *EXEMP1*。以下行风险(*EDR*)为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1)至列(3),结果显示冗员负担与下行风险显著正相关,冗员负担和下行风险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4.261, *P* 值小于 1%,下行风险在冗员负担与审计费用之间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冗员负担通过增加经营风险从而提高审计费用。以代理成本(*AGCOST*)为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4)至列(6),结果显示冗员负担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冗员负担和代理成本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7.574, *P* 值小于 1%,即冗员负担通过增加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审计费用。以负向盈余管理水平(*DA⁻*)为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7)至列(9),结果显示冗员负担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冗员负担和盈余管理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6.892, *P* 值小于 1%,即冗员负担通过增加负向盈余管理而提高审计费用。假设 2.1、假设 2.2 和假设 2.3 均得到了验证,即政策性负担通过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三个途径影响审计收费。

表 2 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EXEMP 变量	(1) <i>EXEMP1</i>	(2) <i>EXEMP2</i>	(3) <i>EXEMP3</i>	(4) <i>EXEMP4</i>
<i>EXEMP</i>	0.041 *** (9.40)	0.041 *** (9.63)	0.038 *** (8.96)	0.034 *** (6.25)
<i>Size</i>	0.318 *** (89.38)	0.317 *** (89.28)	0.318 *** (89.34)	0.317 *** (89.08)
<i>LEV</i>	0.152 *** (10.05)	0.147 *** (9.73)	0.150 *** (9.93)	0.142 *** (9.45)
<i>REC</i>	0.158 *** (4.42)	0.160 *** (4.48)	0.160 *** (4.48)	0.166 *** (4.66)
<i>INR</i>	-0.149 *** (-6.44)	-0.150 *** (-6.48)	-0.149 *** (-6.47)	-0.143 *** (-6.17)
<i>OCF</i>	0.010 (1.23)	0.008 (1.04)	0.009 (1.13)	0.010 (1.30)
<i>ROA</i>	-0.013 (-0.37)	-0.004 (-0.10)	-0.007 (-0.18)	-0.032 (-0.92)
<i>GROWTH</i>	0.006 ** (2.25)	0.006 ** (2.08)	0.006 ** (2.20)	0.008 *** (2.72)
<i>TOP1</i>	-0.000 (-1.15)	-0.000 (-1.13)	-0.000 (-1.17)	-0.000 (-1.24)
<i>BOARD</i>	0.006 *** (3.22)	0.006 *** (3.28)	0.006 *** (3.22)	0.006 *** (3.25)
<i>BIG4</i>	0.254 *** (15.68)	0.254 *** (15.68)	0.253 *** (15.59)	0.255 *** (15.72)
<i>MAO</i>	0.084 *** (8.49)	0.083 *** (8.45)	0.084 *** (8.49)	0.086 *** (8.74)
<i>Intercept</i>	6.225 *** (83.69)	6.240 *** (83.99)	6.225 *** (83.66)	6.234 *** (83.66)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23122	23122	23122	23122
<i>Adjust R²</i>	0.557	0.557	0.556	0.55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下同。

表 3 政策性负担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检验

中介变量	<i>EDR</i>			<i>AGCOST</i>			<i>DA⁻</i>		
	(1) <i>lnFEE</i>	(2) <i>EDR</i>	(3) <i>lnFEE</i>	(4) <i>lnFEE</i>	(5) <i>AGCOST</i>	(6) <i>lnFEE</i>	(7) <i>lnFEE</i>	(8) <i>DA⁻</i>	(9) <i>lnFEE</i>
<i>EXEMP1</i>	0.053 *** (8.46)	0.002 *** (4.98)	0.050 *** (8.09)	0.067 *** (16.38)	0.013 *** (10.63)	0.064 *** (15.62)	0.063 *** (11.69)	0.008 *** (11.65)	0.058 *** (10.75)
<i>Mediator</i>			1.200 *** (8.24)			0.238 *** (10.79)			0.635 *** (8.55)
<i>Intercept</i>	5.859 *** (73.31)	0.044 *** (8.70)	5.806 *** (72.62)	5.890 *** (101.18)	0.859 *** (49.56)	5.686 *** (93.09)	5.790 *** (71.48)	0.185 *** (18.47)	5.673 *** (69.25)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11674	11674	11674	23122	23122	23122	11857	11857	11857
<i>Adjust R²</i>	0.615	0.422	0.617	0.622	0.353	0.624	0.652	0.364	0.655
<i>Sobel Z</i>		4.261 ***			7.574 ***			6.892 ***	

①由于计算业绩下行风险需要连续 10 年的财务数据,因此 *EDR* 样本数较少;*DA⁻* 为负向盈余管理样本,样本数约为全样本的一半。相关性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三)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由于受到政府干预,我国企业普遍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政策性负担水平受到审计师行为影响的可能性较低,因而本文较少受到反向因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政策性负担增加了审计费用,但这可能是由于遗漏变量而引起的,例如公司战略或企业文化等企业固有特征同时增加了员工雇佣和企业风险。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选择滞后一期的冗员负担(L_EX_EMP)和冗员负担的年度-行业均值(M_EXEMP)作为政策性负担的工具变量,这两个变量与冗员负担高度相关,但不直接影响当期审计收费。本文检验发现这两个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4,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衡量冗员负担的两个变量($EXEMP2/EXEMP3$)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①,模型的Wu-Hausman检验P值均大于1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冗员负担与审计费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

2. 仅保留冗员为正的样本

基于前文计算企业冗员程度的方法,当 $EXEMP < 0$ 时企业实际雇员人数小于预期值,此时这类公司样本可能并不存在冗员问题,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时仅保留 $EXEMP > 0$ 的公司样本,重复表2和表3实证过程,考察冗员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冗员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依然成立^②。

(四) 进一步分析

1. 考察劳动保护的影响

政策性负担能够对审计风险造成影响主要是由于冗员负担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并降低了公司业绩,导致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的增加。我们可以推测,劳动力成本越高,企业冗员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显著。劳动保护程度是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最低工资标准是一项重要的劳动保护制度,我国2004年颁布《最低工资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影响本地区企业用工成本。在劳动保护较强、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冗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增加,冗员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为了检验不同劳动保护政策下,政策性负担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差异,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最低工资标准与冗员负担的交乘项($MWS \times EXEMP$), MWS 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当年最低工资水平上限的自然对数。回归结果见表5,利用四种方式衡量的冗员负担与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乘项($MWS \times EXEMP$)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冗员负担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受到地方劳动保护政策的影响,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劳动力成本越高,冗员负担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本文还考察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我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劳动者保护水平,对用工企业雇佣和解雇行为进行了限制,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和解雇成本^[26]。《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冗员负担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风险和代理问题,最终增加审计风险,本文可以推测《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冗员负担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强化。参考杨德明等的方法^[5],本文将样本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分为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实施前为2007年和2008年,为使样本数量相近,实施后选择2009年和2010年),并利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回归结果见表6的列(1)、列(2)。通过组间比较

表4 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

EXEMP 变量	(1)	(2)
	EXEMP2	EXEMP3
EXEMP	0.071 *** (14.47)	0.073 *** (15.27)
Intercept	6.157 *** (86.00)	6.121 *** (85.5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N	20457	20457
Adjust R ²	0.616	0.616

表5 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

EXEMP 变量	(1)	(2)	(3)	(4)
	EXEMP1	EXEMP2	EXEMP3	EXEMP4
$MWS \times EXEMP$	0.056 *** (3.18)	0.052 *** (3.20)	0.055 *** (3.36)	0.038 * (1.67)
EXEMP	-0.323 *** (-2.61)	-0.295 *** (-2.60)	-0.316 *** (-2.75)	-0.171 (-0.98)
MWS	0.541 *** (10.79)	0.539 *** (10.74)	0.541 *** (10.79)	0.524 *** (10.30)
Intercept	2.445 *** (6.88)	2.501 *** (7.04)	2.449 *** (6.89)	2.528 *** (7.0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880	22880	22880	22880
Adjust R ²	0.634	0.634	0.635	0.633

①EXEMP1 是模型(2)分行业-年度回归残差,因此所有EXEMP1的行业-年度均值都会趋近于0,并不适合作为工具变量。

②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回归结果,相关表格留存备索。

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冗员负担的回归系数显著更大,冗员负担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强化。

2. 考察产权性质的影响

由于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国企自身存在多元经营目标,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国企审计风险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分国企样本与非国企样本进行检验,由表 6 列(3)、列(4)结果可见,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均增加了审计收费。本文利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组间差异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回归系数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说明政策性负担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3. 区分审计投入和风险补偿

政策性负担增加了审计收费,但审计收费的增加可能是为了补偿审计师的额外投入,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弥补审计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收取的溢价^[27]。为了进一步探讨政策性负担导致的审计费用增加源于对审计投入的补偿还是审计风险溢价,参考褚剑等的方法^[12],本文利用审计时滞即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天数的自然对数(lnLAG)来衡量审计师投入,若政策性负担增加了审计程序,那么政策性负担与审计时滞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再将审计投入加入模型(1),若控制审计投入后政策性负担仍然可以增加审计收费,则说明冗员负担增加审计费用也有审计风险溢价的原因。以审计投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政策性负担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政策性负担增加了审计投入;在控制了审计投入后,政策性负担仍然可以显著增加审计费用,这表明审计收费的提高是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溢价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我国企业普遍背负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从审计费用视角出发,以冗员负担代表政策性负担,检验了政策性负担的负面效应,从员工配置和劳动力成本角度考察政策性负担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冗员程度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即审计师所做出的风险应对决策考虑到了政策性负担所导致的审计风险;政策性负担通过增加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操纵提高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受到劳动保护的影响,在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较强;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加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增加既是由于审计师提高了审计投入造成的,也有风险溢价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存在不利影响,会显著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加重代理问题,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风险已经为外部审计所关注,并且成为审计师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的重要事项。因此,政府部门干预微观企业时不仅要关注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还应考虑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过度干预。从企业层面看,当政策性负担较重时,可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等手段,缓解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关注客户政策性负担水平并采取适当风险管理策略加以应对,当客户所在地区劳动保护力度较强或为国有控股时,企业往往更难摆脱政策性负担,此时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更应该关注政策性负担对审计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监管部门也应出台相关规则,引导审计师关注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审计风险,并提示审计师在进行风险评估时考虑客户的雇佣效率。

参考文献:

- [1] 张敏,王成方,刘慧龙. 冗员负担与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J]. 金融研究,2013(5):140-151.
- [2] 曾庆生,陈信元. 国家控股、超额雇员与劳动力成本[J]. 经济研究,2006(5):74-86.

表 6 分组回归结果

分组	(1) 实施前	(2) 实施后	(3) SOE = 0	(4) SOE = 1
EXEMPI	0.020 ** (2.14)	0.041 *** (4.52)	0.063 *** (12.35)	0.078 *** (11.55)
Intercept	6.302 *** (31.78)	6.470 *** (37.55)	6.500 *** (83.24)	5.079 *** (56.3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72	2454	13044	10078
Adjust R ²	0.579	0.558	0.578	0.666
系数差异	0.021 **		0.022 **	

- [3] 薛云奎,白云霞. 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J]. 管理世界,2008(10):96-105.
- [4] 廖冠民,沈红波.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J]. 中国工业经济,2014(6):96-108.
- [5] 杨德明,赵璨. 超额雇员、媒体曝光率与公司价值——基于《劳动合同法》视角的研究[J]. 会计研究,2016(4):49-54.
- [6]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 管理世界,2013(5):100-115.
- [7] 梁莱歆,冯延超.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J]. 中国工业经济,2010(10):127-137.
- [8] 鄢波,王华,杜勇. 地方上市公司数量、产权影响与政府的扶持之手[J]. 经济管理,2014(7):164-175.
- [9] 邢立全,陈汉文.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审计收费——基于代理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考量[J]. 审计研究,2013(3):50-58.
- [10] 方红星,张勇.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决策[J]. 会计研究,2016(1):79-86.
- [11] 蔡利,毕铭悦,蔡春. 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师认知[J]. 会计研究,2015(11):83-89.
- [12] 褚剑,秦璇,方军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决策[J]. 会计研究,2018(12):85-91.
- [13] 黎文靖,郑陶陶. 进口竞争提高了审计收费吗?——基于经营风险理论[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4):15-23.
- [14] Jensen M.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4):323-29.
- [15] Griffin P, Lont D, Sun Y. Agency problems and audit fees: Further tests of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J].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09, 50(2):321-50.
- [16]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161-190.
- [17] 林毅夫,李志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2004(2):17-27.
- [18] 王红建,李青原,邢斐.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4(7):157-167.
- [19] Bawa V S. Optimal rules for ordering uncertain prospec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5, 2(1):95-121.
- [20] 袁建国,程晨,后青松.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J]. 管理科学,2016(4):2-16.
- [21] 伍利娜. 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03(12):39-44.
- [22]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23] Konchitchki Y, Luo Y, Ma M L Z, et al. Accounting-based downside risk, cost of capital, and the macroeconom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5, 21(1):1-36.
- [24] Ang J S, Cole R A, Lin J W.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1):81-106.
- [25] 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5, 70(2):193-225.
- [26] 黄平. 解雇成本、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劳动合同法》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2012(3):79-94.
- [27] DeFond M, Zhang J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4, 58(2-3):275-326.

[责任编辑:刘 茜]

Policy Burdens and Audit Fees: Evidence Based on Redundant Employees

CHU Youwei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nterprises generally bear a certain degree of policy burden, and the impact of policy burden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academ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fees,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 from 2007 to 2018 to examin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olicy burdens represented by redundant employe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redundancy employees of the enterprise, the higher the audit fees charged by the auditor. Earnings downside risks, rising agency costs and incre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re the three channels that lead to these effect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burden and audit fees is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labor protecti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burden and audit fees is stronger when the degree of labor protection is greater. The impact of policy burdens on audit fees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audit fees for policy burden is due to both the auditor's increased audit investment and the risk premium compon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burden has obviou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auditor consider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policy burden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Key Words: policy burden; redundant employees; audit fees; operational risk; agency cost;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opinion; audit risk